

中國書局 輝煌時代

睡獅覺醒

陳 堅 王欽雙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目 錄

第一章 東方睡獅	9
夕陽晚照	9
死水一潭	15
由盛轉衰	19
 第二章 落後捱打	25
列強崛起	25
中英貿易	31
禁煙運動	35
鴉片戰爭	41
國門洞開	45
 第三章 師夷長技	49
開眼看世界	49
“末世”吶喊	54
師夷長技	58
嚮往民主	62

第四章 釜底抽薪	67
金田狂飆	67
“人間天國”	72
資政新篇	75
天國敗亡	77
 第五章 自強求富	 83
洋務興起	84
洋務派的形成	86
歧見與紛爭	89
“自強求富”	92
不成功的變革試驗	101
 第六章 改良訴求	 105
“枯樹新芽”	105
暗流湧動	109
改良新潮	112
承前啟後	116
 第七章 戊戌變法	 119
甲午之痛	119
公車上書	123
維新派崛起	125
激烈論戰	131
光緒新政	133
血染菜市口	135

第八章 大浪淘沙	139
義和團運動	139
憲政鬧劇	145
革命派崛起	149
激烈辯論	152
武昌起義的槍聲	155
深入閱讀	159



康熙皇帝朝服像

【第一章】

東方睡獅

中國是位於亞洲東部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經過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發展，至清康熙乾隆時期，社會經濟取得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成就，呈現出一片興旺繁榮的景象。但好景不長，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統治者們卻表現出驚人的麻木和極度的愚昧。極端的閉關，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距離大大拉開了。自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清王朝已經走上衰敗的道路，往日的東方雄獅似乎日現疲態，昏昏欲睡，一蹶不振。

夕陽晚照

清朝開國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經有過一番興旺的氣象。康熙皇帝（1662—1722 年在位）勵精圖治，對內重視安定統一，發展社會經濟，對外維護國家主權，抵抗侵略，有

效地遏止了來自海上和陸上(沙皇俄國)的殖民擴張。到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國勢達於鼎盛,史稱“康乾盛世”。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其經濟取得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成就。它的農業、手工業、科學工程、城市發展等,都曾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

清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同前代相比較並沒有本質的進步,但農業技術卻有了明顯的提高。康熙、雍正年間,水稻在北方試植成功,從根本上改變了京津一帶糧食品種結構。一些新作物的引進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番薯的推廣、玉米的引進等,此外,桑、棉、茶、蔗、煙等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得到大力發展,尤其是桑、棉等在清代出現高度商品化的特點。江南地區的桑蠶舉世聞名,形成以杭州、嘉興、湖州為中心的桑蠶飼養區。廣東珠江地區形成桑蠶魚塘的立體經營模式,桑蠶業的發展引人注目。由於農業技術的改進和良種的推廣,中國的糧食收穫率較高,農作物總產量佔世界第一位。

在農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手工業生產規模也得以不斷擴大。康熙中期以後,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經濟得到發展,手工業工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各個手工業部門也有了一定的進步和發展,其中,採鐵、冶鐵就是當時國民經濟中極其重要的手工業部門。全國各地有不少規模較大的採鐵、冶鐵工場,如廣東佛山“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晝夜烹煉,火光燭天”。清

代的採煤業也極為普遍，各地有許多煤窯。政府除按照一般田賦則例收稅外，沒有特殊的煤礦稅，管制比銅鐵礦更加鬆弛。河北、山西是主要的產煤區，特別是北京城人口眾多，燃煤的需要量很大，郊區煤窯林立。江南紡織業在清代得到更加迅速的發展，出現了機戶開設的手工工場，雇傭著大量手工工人，如當時江寧（今南京）著名的機戶李扁擔、陳草包、李東陽等，各自擁有四五百張紡織機。也有的人自己不開設作坊，只是“散放絲經，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由此可見，江南一帶的絲織業，除了被織造局控制的一部分外，也有少數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在此基礎上，市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育。糧食、布匹、棉花、絲、綢緞、茶、鹽成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為三點五億銀兩（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第284頁），如果加上煙、酒、糖、油、煤、鐵、瓷器、木材，不少於四點五億兩，以當時人口三億計，人均商品流通值為銀一點五兩。

伴隨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清朝的對外貿易出現了急劇增長勢頭。主要出口商品有茶、絲、土布，尤以茶葉佔第一位。十八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平均從中國購買茶葉值銀四百萬兩。而英國商人運到中國來銷售的主要商品（毛織品、金屬、棉花）的總值，尚不足以抵銷從中國運出的茶葉一項。為了平衡貿易收支，英國商人必須運送大量白銀到中國。康熙年間，清朝

徵收的關稅正額有銀四萬三千兩，實際上關稅收入大大超過“正額”。乾隆末，每年“盈餘”（即超額部分）已達八十五萬兩，超過康熙年間所定關稅正額的二十多倍。正是為了平衡對華貿易逆差，英國把大量鴉片運進中國，並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

不僅如此，隨著分工不斷擴大，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城市以及一些市鎮也日益繁榮起來。到康、雍、乾時期，北京、揚州、蘇州、江寧、杭州、廣州、佛山、漢口等都已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商業城市，可謂當時中國的八大城市。到十九世紀初，全世界有十大擁有五十萬以上居民的城市，而中國的北京、江寧、揚州、蘇州、杭州、廣州名列其中。我們以北京和揚州為例，來說明當時中國城市與商業的繁榮景象。清代前期，北京不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國北方商業貿易的著名城市。當時北京的交通十分方便，已經初步形成了四通八達伸向全國各地的水陸交通網，這給北京工商業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北京最繁華的地區並不是達官貴人聚集的內城，而是在宣武、正陽、崇文三門以外。那些富商大賈，擁有成千上萬的財富，在三門以外經營工商業。到乾隆時期，正陽門外大柵欄一帶，已經成為商鋪林立、人來人往的熱鬧去處。與北京相比，揚州城商業氣氛顯得更加濃厚。乾隆年間，由於鹽業、漕運的發展，揚州商業十分繁盛，如供應巨商大賈、達官貴人衣著的綢緞舖，集中在緞子街；供有閑階級消遣的酒樓茶肆，集中在

北門橋、虹橋附近。乾隆南巡到達揚州時，留下了“廣陵風物久繁華”、“廣陵繁華今倍昔”的詩句。

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奠定了基礎，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一時期，數學研究是相當活躍的，就數學家人數和有關專著的數量而言，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雖然當時中國的數學整體已落後了，且與正在興起和迅速發展的西方近代數學相比差距越來越大，但中國的數學家們通過刻苦鑽研和不懈努力，在發掘、整理、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數學以及消化、吸收西方數學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和具有獨創性的成果，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並逐漸完成了由常量數學到變量數學和由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的演變。康熙年間編撰的《律曆淵源》一百卷，其中數學部分《數理精蘊》共分五十三卷，包括上編“立綱明體”五卷，下編“分條致用”四十卷，數學用表四十種八卷，這是一部當時中國數學和引進的西方數學知識的百科全書，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



《御製數理精蘊》（康熙內府銅活字印本）



康熙年間製作的地球儀

國的數學水平。

除數學外，天文學在清代也有一定的發展。順治年間，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將原有一百三十七卷的《崇禎曆書》刪改壓縮成一百零三卷，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進呈給清政府。《西洋新法曆書》是當時欽天監官生學習新法的基本著作和推算民用曆書的理論依據。康熙年間，在《西洋

新法曆書》基礎上進行了修訂，編撰完成《曆象考成》。雍正、乾隆年間，《曆象考成》經歷了多次修訂，最後編撰成《曆象考成後編》。後編比前編有較大的進步，如拋棄了過時的小輪體系，應用了開普勒第一定律（橢圓運動定律）和第二定律（面積定律），增補了關於視差、蒙氣差的理論與採用了較精確的數據等。

總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到封建社會的晚期，中國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並以高度的農業文明著稱於世，呈現出盛世的輝煌。至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三

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以致英國遲遲不能扭轉對華貿易的逆差。古代中國取得的成就，贏得了世界的讚譽。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稱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法國《百科全書》的主編狄德羅在該書“中國”條目中，盛讚“中國民族，其歷史之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死水一潭

“康乾盛世”時期，清王朝所呈現出的繁榮景象，並無法掩蓋其內在的停滯和頹勢。尤其是在面對世界的發展進步，面對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時，清王朝表現出驚人的愚昧和麻木，妄自尊大，滿足現狀，囿於傳統，反對變革，蔑視科學，禁錮思想，加強集權，使龐大的中國猶如一潭死水，萬馬齊喑，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康熙時期的經濟政策，仍然是傳統的重本輕末，即十分重視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生產，而對獨立手工業和商業卻不太重視，具體體現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法令上，如大力興修農業水利設施；獎勵蠶桑紡織等。同時，又頒佈禁令禁止獨立手工業中的採礦業、冶礦業等。在通商方面，康熙前期仍實行比較嚴格的限制商品流通政策，尤其是海外貿易方面。直到 1684 年，鑒於



清朝皇帝親耕圖（銅版畫）

清王朝統治日趨穩固，康熙才改變原來的“寸板不許下海”的禁海政策，實行有限度的海外貿易政策。乾隆帝沿襲前輩們所推崇的重本抑末思想，也將打擊工商業、壓抑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作為治國的根本經濟原則。他明確表示：“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心力南畝……將使逐末者漸少，奢靡者知戒，蓄積者知勸。”這一段話，充分表明了他的壓縮工商業經濟、鼓勵發展農業的思想。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乾隆在位時期厲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如擴大徵稅範圍、提高商稅稅率。在繁重的商稅制度下，商賈外出販運必遭多方榨取，連商賈旅宿吃飯都須額外加款，有些地方商人坐在舖中也要交款。在對外貿易方面，乾隆帝基本上也採用康熙以來的外貿政策和措施，實行緊縮外貿，取消

通商口岸政策（只開放廣州港）。由於清王朝統治者實行了上述一系列不利於工商業成長的經濟政策，從而將中國與世界隔離起來，使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終於釀成了近現代社會的落後結局。

清王朝實施閉關政策，極大地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十七、十八世紀，西歐走出了中世紀的牢籠，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學迅速發展，放射出光輝異彩。而中國知識界卻閉目塞聽，沉溺於理學、八股、考據、詞章之中，踏步不前。清政府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國文化科學視為離經叛道的邪說，限制外國書籍流傳。康熙時期，北京等地有一批外國傳教士，他們帶來某些科學知識，但由於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政府禁令，這點兒有限的科學技術知識也得不到傳播、推廣，更不可能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康熙末年，清朝和羅馬教廷發生爭執，限制了傳教活動。雍正初年，完全禁止天主教，這就像把髒水和孩子一起傾倒掉一樣，掐斷了中西文化僅有的一點兒微弱的聯繫。中國被嚴密地封鎖在世界之外，知識界不但不能向外國學習，也根本不了解中國以外的情況。歐美諸國日新月異，而中國停滯不前，依然故我，越來越沒落下去。

與其他封建王朝一樣，清王朝吸取了歷代封建專制統治的經驗，從一開始就採取嚴密的控制措施，加強封建專制，防範一

切可能動搖、侵犯和篡奪皇權的行為發生。如順治帝在位時，就規定：太監干政、結納官員、擅奏外事，要受凌遲處死。而且，太監受內務府衙門的嚴格管理，不能形成自身的權力體系，各級官吏可以監督外出的太監。乾隆帝時，一個很低微的熱河巡檢張若瀛杖責不法太監，受到獎勵。對於朋黨問題，清代初年就嚴厲禁止，並在各地的府學、縣學內設立臥碑。康熙帝明確指示：“人臣分立門戶，私植黨羽，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雍正帝更是痛恨朋黨，並專門寫了一篇《朋黨論》，告誡百官，以穩固專制皇權。

更為甚者，清王朝在強化專制制度的同時，還大興文字獄，加強對人們思想的控制。文字獄，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望文生義，捕風捉影，任意羅織罪狀，是專制皇帝用以震懾官吏、知識分子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裡，文字獄屢見不鮮，而清朝的文字獄，其次數之多、株連之廣泛、處罰之殘酷，超過了以往任何王朝。清代文字獄開始於康熙時期，其最初是針對流行於社會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而採用的一種嚴厲措施。康熙時期最著名的兩樁文字獄案分別是莊廷鑑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中，《南山集》案很能說明問題。此案發生在康熙後期，翰林院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該書因使用南明諸帝年號，觸犯清政府大忌。康熙帝下令對此案追根刨底，牽連甚眾，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販賣的，

與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均得罪被捕，其中有名士方苞、王源等。到雍正時期，案件數目比前朝明顯增多，罪名更加苛細，吹毛求疵，甚至故意羅織成獄。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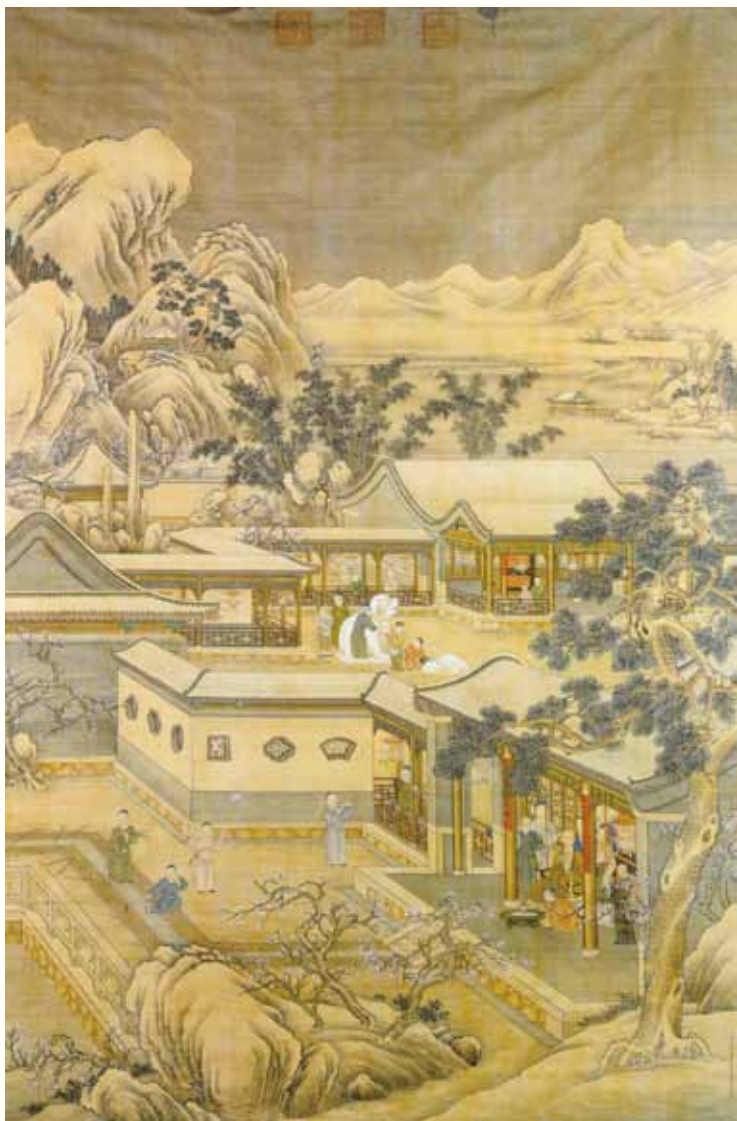


戴名世《南山集》

多案件，並不單純由於文字內容獲罪，而是雍正帝假文字獄之名，打擊異己勢力。雍正帝開了惡劣的先例之後，清政府經常以文字獄抓人，而且都以大逆不道論處，治罪十分殘酷，株連甚眾。乾隆時期，文字獄更是家常便飯了。在這種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很多文人提心吊膽，不敢議論朝政，不敢編寫史書，只是埋頭於故紙堆，養成了煩瑣的考據學風，窒息了思想，摧殘了人才。

由盛轉衰

在全球大變局面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自恃“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而拒絕開放、拒斥變革，其結果是一百多年



乾隆朝行樂圖

的“盛世”之後中國社會驟然下跌，最終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

事實上，乾隆末年，清王朝已明顯地由盛轉衰。自嘉慶朝（1796—1820）至鴉片戰爭前夜，整個封建主義制度已經危機四伏，四面楚歌。

土地兼併嚴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突出表現。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地主階級、貴族和皇帝佔有大量土地，農民則很少或完全沒有土地。這種土地兼併與集中的現象，到了十九世紀初已十分驚人。據1812年（清嘉慶十七年）統計：直接、間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達八十三萬頃（每頃一百畝）。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佔有大量的土地，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擁有數百萬畝，或“膏腴萬頃”；江南一帶，豪強兼併，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手裡，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無田”。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再加上人口驟增，而耕地和生產的增長卻極為有限，也給社會帶來極大的負擔。在日益加重的地租、賦稅、徭役和高利貸剝削下，人民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吏治日益腐敗，大小官吏貪污成風，賄賂公行，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又一重要表現。乾隆時期，總攬朝政達二十多年的權臣和珅，其各種不義之財竟達四億兩之巨，相當於當時清政府

八年的財政總收入。1841年大學士琦善被抄家，也查出黃金一萬多兩、白銀一千八百多萬兩、珠寶十一箱。地方官吏巧取豪奪，更是無孔不入。正如當時民謠所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嘉慶年間，四川一位道員為巴結上司，一次獻出珍珠三斗，蜀錦一萬匹。這些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又通過各種手法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使廣大人民群眾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生活。

清王朝的沒落，還表現在軍隊腐敗、武備廢弛上。道光時期，清朝的八旗兵和綠營兵中不少人開始吸食鴉片，軍紀敗壞，又不經常操練，甚至京城駐軍也“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閑遊，甚或相聚賭博”。軍官上自提督總兵，下至千總把總，剋扣軍餉，大吃空名，稱之為“蔭糧”。如果上級來檢查的話，大官小官紛紛移東補西，或一人頂充數名，或暫時雇傭商人敷衍塞責，彼此包庇。軍隊的腐敗，直接導致國家軍費不足，軍備廢弛。有些地方，騎兵無馬可騎，水勇不習水戰。有些地方雖然有較好的武器裝備，但是士兵們能熟練運用者甚少。據兩江總督裕謙檢查，“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能知放炮之法者，惟……林亮光尚稱諳練，餘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按炮位，幾同虛設”。至於沿海水師所用戰船，大多是以“薄板舊釘”製成，“遇擊即破”。這樣的軍隊，除了擾民劫財，已經沒有甚麼抵禦外來侵略的能力了。

土地兼併的加劇、吏治腐敗的加深，導致人民負擔進一步加重。廣大勞動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除了不斷地、普遍地進行抗糧、抗捐鬥爭外，還以各種形式同清政府展開武裝鬥爭。如1796—1804年，湖北、貴州爆發了歷時十年之久的苗民石柳鄧



清軍清剿白蓮教起義佈防圖

起義；1813年，又爆發了白蓮教支派天理教起義，起義以河南為中心，擴大到山東、直隸等省，京郊的一支起義軍，竟然潛入北京，打進皇宮，使清廷震驚不已；1831年，兩廣地區發生了瑤民起義；1835年，山西發生曹順起義等。這些起義的特點，多以秘密結社形式發展到與反動統治進行公開的武裝鬥爭。與農民起義相呼應，城市也發生了商人和手工業者反抗封建統治的鬥爭。商人罷市鬧衙，手工業工人“齊行叫歇”。1822年，蘇州

發生了紡織工人王南觀等搗毀機戶李升茂家，迫使機戶增加工資的鬥爭。1813年，陝西發生了由萬五領導的木工起義，起義由四百人迅速發展到五千人，以太白山為據點，轉戰戶縣、盩厔（今陝西周至）、隴縣等地，並有五百鐵工參加，震動整個陝西，直至次年才被鎮壓。清王朝“禍積有素”，封建制度已經快走到它的盡頭。

【第二章】

落後捱打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面臨著的是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局。一方面，中國面臨著的敵人不再是古代的“蠻夷之敵”；而是空前強大而又帶著血腥味的西方殖民主義者；另一方面，統治中國的，卻是腐朽、專制、守舊且已經趨向沒落的清王朝。這種東西方對弈的新格局，預示著中華民族命運的坎坷與苦難。落後就要捱打，這種森林法則在十九世紀的殖民時代不斷上演。隨著西方殖民者用槍炮強行轟開中國的國門，中國被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

列強崛起

正當清王朝國勢衰微，日趨沒落的時候，西方社會爆發了一系列改天換地的偉大革命，迅速地脫離傳統的發展路線而突然加速前進，導致歐美資本主義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東西方

的歷史走向出現了巨大的反差。

十四世紀，在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此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歐洲各國封建社會內部得到持續的發展，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創造了條件。

1640 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至十八世紀，英國、美國、法國等先後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創造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證。

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歐美資本主義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相比於封建主義有著極大的優越性，推動了英、法、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強盛，逐漸拉開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差距。

英國是當時第一個資本主義強國，擁有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在十七世紀中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後，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開始了產業革命，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從工場手工業階段向機器大工業階段的飛躍，使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英國的棉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大規模的織布工廠，從 1770 年到 1841 年這七十年間，棉紡織業的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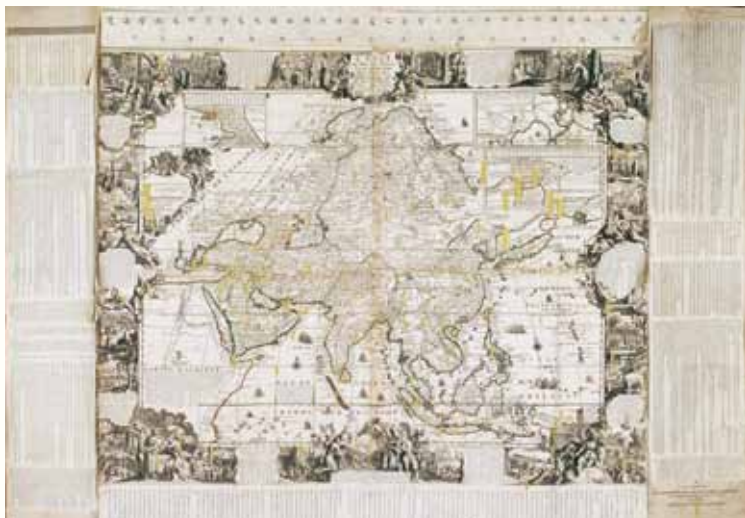
通運輸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輪船及蒸汽機車已開始普遍使用，煤鐵等工業的產量也快速增加。到十九世紀初，英國已基本上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為適應炮艦政策和經濟掠奪的需要，英國的軍事工業也在急速發展。當時，它不僅擁有靠帆航行的軍艦，而且還裝備



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像

了蒸汽機動力艦船。軍事實力的提升，為英國開闢新的商品市場提供了武力保障。十九世紀中葉，這個只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的島國生產的工業品約佔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五，並佔有世界上商船艦隊數量的三分之一，擁有全世界貿易總量的五分之一。為了對外擴張、掠奪殖民地、擴大商品市場，英國先後挫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海上霸主”，在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建立了號稱“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國。1825年，英國發生了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工人失業，無產階級掀起規模巨大的反抗運動。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為了擺脫危機，更加瘋狂地向外掠奪殖民地。1838年，迫使伊朗訂立了不平等條約；1839年，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接著，就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東方的中國。

法國在當時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過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法國的工業獲得迅速發展，開始廣泛使用機器。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也積極向外擴張，搶奪殖民地。它首先在非洲以武力強佔阿爾及利亞的部分領土，又企圖侵佔摩洛哥和突尼斯，並與英國爭奪埃及。與此同時，法國對遠東地區的中國等地早已垂涎三尺，以披著宗教外衣的傳教士為先鋒隊，在中國南方早就開始了侵略活動。



法國學者進呈給康熙的《亞細亞洲圖》，1698年法國科學院巴黎天文台繪製

遠在另一大陸的美國，於1776年7月4日發表“獨立宣言”，在反英戰爭勝利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美國的資本主義起步雖較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它的農業機器生產數量迅速超過歐洲各國。至1850年，鐵路總長達一萬五千里，居世界第一。美國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十九世紀初，它利用歐洲混戰之機，迅速發展商業，獲得巨額利潤。1805年，美國掌握了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二。美國一直積極向海外擴張，在對華貿易方面僅次於英國。當英國大肆對華侵略時，美國就成為它的重要幫兇。

沙皇俄國本是一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並不接壤。十六世紀



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像

下半葉，沙皇俄國開始越境，吞併西伯利亞，然後又靠近中國的西北邊境，並開始了侵略中國領土的罪惡活動。俄國原本是一個長期處於封建農奴制的國家，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它也開始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十八世紀後期出現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十九世紀初開始在棉織業中使用機器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直到十九世紀

前半期，封建經濟仍佔統治地位。

考察十九世紀頭四十年的歷史變遷，比較兩種社會制度的發展趨勢，到鴉片戰爭前夕，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封建社會在衰落，而西方資本主義在發展。一個落後了，成為弱者；一個先進了，成為強者。正是在中西形勢發生陡然逆轉之時，中國碰到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這個兇惡的對手。

中英貿易

中國同許多國家和地區，很早就存在著通商貿易關係。十六、十七世紀時，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商人，就已經在中國廣東、福建等沿海一帶進行海盜式的劫掠活動：葡萄牙商人於1557年通過欺騙與脅迫的方式，竊據了澳門；西班牙傳教士1575年來到福建；1601年荷蘭人、1637年英國人先後來到中國，其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據絕對優勢。

東印度公司創立於1600年，是英國侵略遠東的巨大殖民地機構。它有“皇家特許狀”，有軍隊和艦隊，“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直到1834年取消專利權之前，東印度公司一直壟斷英國對華貿易。

東印度公司成立後，就開始尋求對華貿易渠道，以便拓展其羊毛織物銷售市場。但是，由於明清政府的限制以及中國國內的動亂，公司的船隻只能在沿海的澳門、廈門、台灣，還有越南的河內等地進行少量的貿易活動。直到 1685 年，因清政府的解禁，英國東印度公司才取得了在廣州開設商館的權利。與此同時，中國的茶葉也開始進入英國，飲茶之風逐漸遍及英倫。1689 年，東印度公司從廈門進口了第一批茶葉。此後，到十八世紀後期，茶已經成為英國每家每戶必不可少的飲料。中國茶葉出口到英國的數量驟然上升，特別是在 1784 年英國為了消滅茶葉走私，並與歐洲各國在茶葉貿易上競爭，將茶葉進口稅從百分之一百一十九減至百分之十二點五以後，貿易額更是成倍增長。

進入十八世紀後，茶葉貿易的高額利潤促使東印度公司日漸擴大在華茶葉貿易，對內嚴禁私人茶葉貿易行為，對外極力排斥他國競爭，力圖將茶葉貿易變為公司專營的壟斷項目，而英國東印度公司自身則日漸成為中國茶葉在歐洲市場的代理商。茶葉生意的發展，激發了英國對中國其他商品的興趣，由此推動了中國的絲織品、棉織品與瓷器大量出口至英國。中英茶葉及絲棉織品等貿易的發展，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資金。據統計，東印度公司每年僅從茶葉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就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萬鎊。而茶葉貿易的真正得益者是英國政



水路運茶圖，廣州，約 1800 年

府。1820 年英政府的茶稅收入為三百萬鎊，1833 年為三百三十萬鎊，1836 年為四百六十萬鎊，佔英國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左右。

儘管如此，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國內還是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原因是由於貿易長期逆差，導致英國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印度公司也一直在設法解決這一難題，甚至在廣州不惜虧本削價銷售英國的毛織品。但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國社會，對西方大工業品卻無所需求，而且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品還有著本能的頑強的抵抗力。這樣一來，英

國運到廣州的毛織品、印花布、棉紗、天鵝絨銷路不暢，連連虧本。連英國商人自己都哀歎在中國“銷售英國棉製品的時代還沒有到來”。而中國的絲、茶、棉、瓷器等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卻為國際市場所需要；加之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在中外貿易中一直居於貿易順差的地位。

為了打破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改變對華貿易的不利狀況，英國資產階級採取了兩種手法：一是強力交涉，一是偷運鴉片。1793年，英國派使臣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要求面見清朝皇帝，只因覬覦見禮節的糾葛，未獲允許，英國所提出開關天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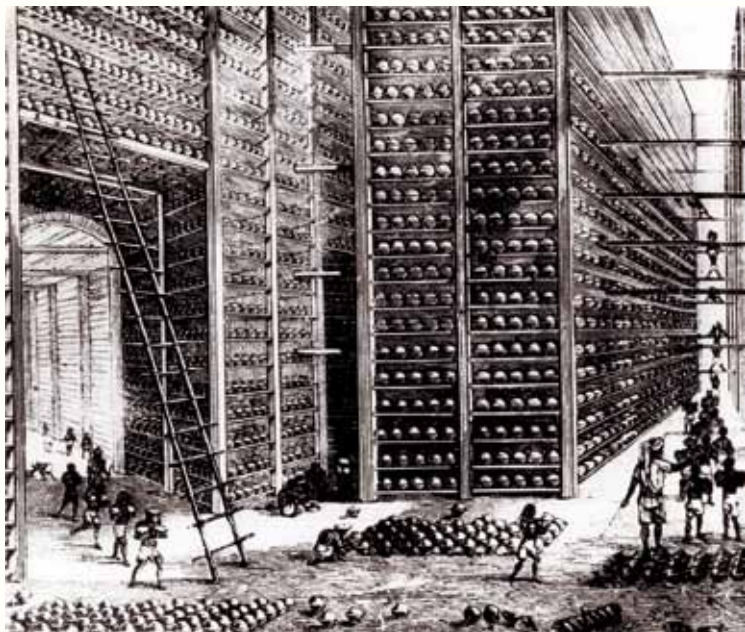


運載禮物的馬戛爾尼使團（絲織掛毯）

地為商埠，割取浙江沿海島嶼等損害中國主權，領土的無理要求，均遭拒絕。乾隆皇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是拒絕英國無理要求的經濟原因，也說明了自然經濟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經濟無所需求的狀況。1816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為使臣來華交涉，要求清政府放寬對廣州貿易的限制，允許開通廣州以北的港口，並提出駐使北京。到北京後，由於在謁見皇帝時跪叩行禮問題上的分歧，他被嘉慶皇帝即日遣回，所提要求一概拒絕。清政府即嚴令地方官員以後不准外國使節進京。英國通過外交途徑無法達到擴大貿易的目的，退而尋求更為卑劣的手段，通過偷運鴉片進入中國獲取更高的利潤。

禁煙運動

鴉片，學名罌粟，俗稱大煙，是用罌粟汁液熬製而成的麻醉毒品，原產於南歐、小亞細亞，後傳入阿拉伯、印度和東南亞等地。因為它有催眠、鎮靜、止痛等功效，自明代以來一直作為藥材徵稅進口。十七世紀，吸食鴉片煙的惡習，從南洋傳入中國。由於鴉片有強烈的麻醉功能，一旦吸食成癮，便難以斷絕，所以很快就作為吸食毒品流傳。自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商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達二百箱左右。1757年英國殖民者佔領



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製造廠倉庫

了印度的鴉片產地孟加拉後，更是開始瘋狂地發展對華鴉片貿易。十年後，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就達到了一千箱。1773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制訂了大量種植及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的政策，並給予東印度公司製造和專賣的特權。東印度公司因此得以十倍於成本的壟斷價格將鴉片賣給私販，後者又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獲利率在中國進行銷售，賺取暴利。這些鴉片煙販從每箱鴉片中所賺取的純利，最多時可達一千元。因此，儘管清政府屢頒禁令，但英國煙販仍不顧中國禁令，加緊鴉片走私。

從十九世紀起，鴉片開始大量流入中國。據不完全統計，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年，英國自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平均約為四千餘箱。而 1838—1839 年時卻達到三萬五千五百箱。罪惡骯髒的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它一方面擴展了英國在印度的市場，另一方面又開闢了英國在中國的市場。英國在印度大量銷售棉紡織品及其他工業品以購買鴉片，然後再用這些鴉片到中國換取它所需要的絲、茶等物。在英—印—中即紡織品—鴉片—絲、茶這個三角貿易關係中，英國資產階級獲取了雙重的利益。

隨著鴉片貿易的不斷升級，中、英之間的貿易逐漸發生變化。英國由原來的入超變為出超，而且這種差額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鴉片在英國出口中國貨物的總值中佔了一半以上。英國通過鴉片每年從中國掠走的銀元達數百萬之多。

鴉片的大量輸入及其氾濫，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隨著鴉片走私數量日益增加，煙害的範圍從東南沿海一帶擴大到內地十幾省。吸食鴉片之風，由達官貴族殃及到紳商以及軍隊官兵，煙民的數量越來越多。據 1835 年的估計，全國吸食鴉片的人數達到二百萬人之多。鴉片是一種慢性的殺人毒藥，對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嚴重的損害。魏源指出：鴉片“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



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洪水猛獸”。連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也說：“同鴉片貿易比較起來，奴隸貿易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摧殘非洲人的肉體，……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沒有腐蝕他們的思想，沒有扼殺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的肉體。”

鴉片氾濫還嚴重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首先，白銀的大量外流，使各地稅收困難，國庫儲備日益減少，財政危機日趨嚴重。1821年到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第二，鴉片輸入使清朝吏治更加腐敗。官員利用鴉片走私和禁煙緝私牟取暴利。第三，鴉片輸入造成工商業

的蕭條和衰落。因種植罌粟的利益數倍於種植小麥，十倍於種稻，因此大片良田被改種罌粟。第四，清軍官兵中吸食鴉片者廣泛存在，使清政府軍隊的戰鬥力日益衰竭。

鴉片輸入在經濟、政治上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使得人們禁煙的呼聲日趨強烈。在清政府內部，也有不少有識人士力主禁煙，如朱嶠、許球、林則徐、黃爵滋等。1836年9月，朱嶠奏請嚴禁鴉片。他指出，鴉片不僅使民弱無可救藥，而且營伍官兵一經沾染，“煙癮來時，手足癱軟，涕淚交流，又安能勤訓練而成功勁旅乎”；朱嶠強調，各省封疆大吏如能督率文武官員，“實力搜查，認真擒捕，取其正者，置之嚴刑”，禁煙一定能夠取得成效。1838年7月至9月，林則徐三次上奏道光皇帝，贊成禁煙主張，並大聲疾呼：“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兵和餉是清朝統治者的命根子，如果“無兵”可使，無銀“充餉”，那將是個多麼嚴重的局面！林則徐的話擊中了要害。道光皇帝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決定採納嚴禁鴉片的主張，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厲行禁煙。

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他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支持下，嚴令捕拿煙販，懲辦受賄官吏，限期令外國商人交出鴉片。他宣佈：外船進口，必須具結，保證“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並嚴肅

表示禁煙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查理·義律極力破壞禁令，阻止英商交煙具結，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鴉片船逃避，並準備武裝挑釁。林則徐堅決打擊義律的破壞活動，下令暫停中英貿易，派兵嚴守英國商人居住的商館。義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繳煙，保證煙價由英國政府賠償。英國鴉片販子



虎門炮台的火藥缸

被迫交出鴉片兩萬餘箱，美國鴉片販子也繳出一千五百餘箱。

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繳獲的鴉片二百多萬斤，集中到虎門，當眾給予銷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虎門銷煙。其方法是：先派人在虎門海灘的高處挖好兩個長寬



林則徐等關於虎門銷煙的奏摺